

1999年2月6日的凌晨4点,电话铃声打破了深夜的宁静,传来了守候在我父亲病榻前的弟妹焦急的声音:“爸爸突然没有血压了……”我急匆匆地冲进病房,只见亲爱的父亲呼吸困难,昏迷不醒,但看惯了母亲近3年来多次昏迷后抢救又得以生还的情景,当时的我还尚未意识到,这已是父亲弥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天……上午8点多,父亲突然清醒。问我,这是在哪里?当他得知是在医院病房后,又问我,住院费是否已预交,交了多少钱?我告诉他,已预交了两万元。他听后,做了一个无可奈何歉意的表情。我深知,他一直为近一年来,因住院治病花费了国家数万元医疗费而深感不安。当吃完最后一顿午餐后,他要求我回家把遗嘱找来,想要修改。但当我把它带回病房时,父亲却已与世长辞,我心如刀割,久久不能相信父亲已离我而去。虽然,父亲决意要修改遗嘱的内容已无人知晓,但我却能理解他老人家的心愿……

一、解放初期,一位朝气蓬勃的年轻教授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已在会计和教育界小有名气的父亲受浙江之江大学(后合并到浙江大学)的聘请,以月薪2两黄金和一座别墅住房为聘金到之江大学会计系任教。这对年仅30岁的年轻教授是多么有吸引力呀,我们全家都为此十分兴奋。因为西子湖的美景,优越的生活条件深深地吸引着。早熟的我和母亲怀着喜悦的心情忙于打点行李,处理搬迁的事宜。父亲则忙于向上海的师友、亲戚辞行。离预定去杭州的日子还有3天,父亲再一次去向他的业师—上海著名的会计学教授安绍芸先生做临行道别。从安先生家回来后,父亲带来了一个令我们全家都感到不可思议的消息:安先生已应东北人民政府的邀请,准备前往东北任职,参加拟定成立的东北会计总局工作,并希望我父亲能共同前往。因为,父亲是安教授少有的得意门徒之一。父亲告诉我们,当时,陈云同志主持东北人民政府的财经工作,颇有眼光的他,深知上海有不少专家、人才,便特派朱理治同志到上海聘请会计专家。

听到这个消息后,向来在大事上不做决策的母亲却坚决反对北上,因为留在南方和北上不仅经济收入有天壤之别:之江大学月薪黄金2两,合旧人民币200万元,而到东北就职,月薪仅为600斤小米,合旧人民币60万元。这对当时我们八口之家是难以维持生计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父亲的60万元的月薪常令我们捉襟见肘。而且塞外寒冷的天气,令南方人望而生畏。但是一生尊师重义的父亲,从不愿辜负恩师的期望,他毅然决定放弃杭州之行而北上迎接新生活的挑战。

1949年9月,在一个大雨天后,我们全家,离开了上海吉祥路安吉里24号,踏上了北去的征途。这一去,历经半个世纪,却给父亲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遇,使他为新中国的会计事业贡献出毕生的精力,成为名扬中外的会计大师。

火车的隆隆声把安绍芸先生和我父亲、胡宝昌、张运秀、刘葵初等南国的7名会计专家以及他们的家属20余人带到了天津,后又去东北沈阳。来时,穿着丝绸衣裙的我,一下火车,塞外的寒寒袭

我的父亲杨纪琬与新中国会计五十年

杨周南

来,赶紧穿上了毛衣、秋裤。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领略祖国疆土的辽阔!在沈阳魁星大旅馆住了近一个月后,由于新中国财经工作建设的需要,安绍芸先生等又受聘去北京政务院的财经委员会报到。一行人又辗转来到首都北京。中财委计划局副局长曹菊如同志接见了他们,并成立了成本价格处安排他们的工作。暂住北京前门西河沿解放饭店数月。后经安先生等同计划局的领导和中财委、财政部的苏联专家研究探索,最后确立制定会计制度的机构应设在财政部。来到财政部后,时任财政部办公厅主任的吴波同志接待了这7位专家,财政部随即设立了会计制度司,由安先生出任司长,又在司下设两个处,我父亲被任命为一处处长,负责草拟会计法规、规章及工业、农业企业基本业务和供销机构的会计制度。这个安排,拉开了父亲为建立新中国会计制度而奋斗终生的序幕。



杨纪琬教授夫妇(1954年摄于北京)

二、新中国第一批会计制度的诞生

父亲凭借着解放前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和多家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从事会计、审计工作积累的丰富的会计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并以他的勤奋好学,不断向苏联专家学习,很快就掌握了计划经济环境下财会工作的规律和特点。他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第一批会计制度的草拟工作中,如:《国营企业决算报告编送暂行办法》、《关于国营企业统一登记会计簿籍、填写会计凭证办法》和《国营工业企业统一成本计算规程》等。

当我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父亲还主持制订了《国营工业企业统一会计科目及会计报表格式》。为了使广大的会计人员能够正确地使用会计科目和编制会计报表,会计一处还编写了《国营工业企业统一会计科目及会计报表格式实例》,内容主要是如何根据假设一个月内发生的数百项业务,填写会计凭证,登记账簿,最后编制会计报表。这个实例倾注了父亲的很多心血,为建国初期会计人员提供了一个学习、模拟会计基本业务处理的很好的范例,为培养新中国会计实务工作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以后,由于受到了“一边倒”左倾思潮的影响,财政部于1955年制订了《国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标准账户计划》、《国营工业企业基本业务标准会计报表和说明》、《国营工业企业凭单日记账簿核算形式的标准账簿格式和使用说明(草案)》等会计制度。这些制度由于机械地套用苏联作法,所以

内容繁琐复杂,名词十分冗长,广大的会计人员难以理解和掌握。我父亲以孜孜不倦的精神和忘我的工作,对制度涉及的内容和名词予以确切的定义,以利于解释和宣传。

由于父亲卓越的业绩,1957年被任命为会计制度司副司长。这是继安先生后,文革前17年中财政部唯一提拔的党外人士出任副司长之职。这并不是出于统战工作的考虑,而是业务工作的需要和党的信任。

三、为大跃进时代的“变革”而拨乱反正

不久,大跃进时代到来。在那个狂热的年代里,全国掀起了一股“改革”旧规章制度的浪潮。在所谓的“大破大立”、“不破不立”和“先破后立”等口号的影响下及批判繁琐哲学、打破条条框框的冲击下,迫于当时的形势,财政部于1958年6月18日和6月30日先后发布了《关于改革企业会计制度办法的通知》和《关于下放拟订地方企业会计制度权限的通知》,结果造成了拟订会计制度的权限层层下放的局面,进而出现了“以单、表代账”、银行账由铁账变成了“豆腐账”的混乱现象。各部门、各地方和全国的汇总会计数据无法取得,给整个国民经济工作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为了尽快扭转这种局面,在家父的领导下,会计制度司经过调查研究,先后制订了若干会计制度规定,着手整顿会计工作秩序。并针对当时会计资料严重不实和企业领导指使会计人员弄虚作假的现象,主持草拟了《会计人员职权试行条例》。该条例于1963年1月3日以国务院名义颁发。为了帮助解决财会人员的一些思想认识问题,调动财会人员的积极性,更好地执行《试行条例》,父亲建议在《工人日报》开辟一个“财会人员讨论会”专栏。这个专栏从1963年5月24日到8月10日共开办了31期,先后讨论了“能不能坚持执行制度”、“财会人员的职权如何正确使用”和“财会人员在增产节约的运动中如何发挥积极的作用”三个问题,受到广大财会人员的热烈欢迎与积极支持。8月24日至9月3日,《工人日报》连续发表了《加强对财会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财会人员的作用》等五篇社论,并刊发了李先念副总理的《对财务会计人员的几点希望》和财政部曾直副部长的《加强财务会计工作,促进增产节约运动》两篇文章,为这次“讨论会”作了总结。最后,《工人日报》将以上文章和社论,以及按三个问题排列的财务会计工作问题讨论的摘要,汇编出版了《光荣的岗位,艰巨的任务——财务会计工作问题讨论专辑》。经过以上一系列举措,“大跃进”年代给会计工作造成的破坏基本得到了纠正,会计秩序逐步恢复正常。

四、文革中的委屈

历史的发展有时会令人啼笑皆非。大跃进时代的阴影尚未在人们的心中彻底清除,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接踵而来。父亲作为财政部第一批被揪斗的黑帮分子、财政部“三家村”成员之一,被迫离开了他所热爱的会计事业,先后被送到湖北沙洋、河北固安等地农场劳动改造。这一别就达10年之久。但无论他走到何方,人们眼中的他,仍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会计专家,常有人向他请教会计问题。在湖北沙洋农场劳动时,湖北财经学院曾有意请他任职讲学。在农场劳动时,父亲插过秧、榜过地、看守过菜地、参加运输队拉过煤……这对从未参加过重体力劳动、年过半百并患过肺结核病的他是多么严峻的考验,全家都为他的身体健康而忧虑。但当他从农场回来时,见他被阳光晒黑的、透着健康的面孔,健步如飞的步伐,我们忐忑不安的心放了下来。父亲终于渡过了文革的难关。他告诉我们,他常以回忆过去的工作和背诵古诗来渡过那漫长、孤寂的时光。并说只要想到自己从未做过危害国家利益的亏心事,老天不会辜负无罪之人,总有一天会回来

与家人团聚并从事所热爱的会计事业,一切疲劳、委屈就都烟消云散了。

五、改革开放,事业上的第二个春天

1976年,“四人帮”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不久,父亲也恢复了名誉和工作。对这失而复得的机会,他格外珍惜,顾不上自己在文革中所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和委屈,以昂扬的斗志和更为饱满的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认为要恢复正常的会计工作秩序,首当其冲的是抓队伍建设,于是着手对1963年国务院发布的《会计人员职权试行条例》进行修订。此项工作由包括父亲在内的三人起草小组负责。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的调查、研究和修改、讨论,《会计人员职权条例》于1978年经国务院批准发布。该条例对各单位建立健全财会机构、充实会计人员以及会计人员的职责权限等都提出了具体要求,对当时情况下重建会计秩序,做好会计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9年,改革开放春风涌动,财政部恢复会计司,父亲自1980年始任司长。不久,已步入花甲之年的父亲,主持并领导了会计司大刀阔斧地展开全面恢复会计业务秩序的工作,包括会计立法、会计核算制度的改革、会计人员管理、会计教育、会计理论研究等各个方面,迎来了他事业上的第二个春天。

他非常重视会计立法工作和会计核算制度改革。父亲根据其对新中国会计工作的经验和见解,认识到要维护会计工作的正常秩序,保障会计工作者依法履行职权,并充分发挥会计工作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必须有法律作保障。为此,他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积极落实全国人大代表关于“会计立法”的提案,从1980年开始着手组织《会计法》的起草工作。为此,一段时间内他潜心研究法律,查阅四库全书,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法律,作了几十万字的笔记,发表了10余篇论文。《会计法》自着手起草到正式发布历时4年多,其间多次进行全国范围的大讨论,每次他都深思熟虑地提出许多问题,引导讨论步步深入。《会计法》易稿数十次,1985年终于顺利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

为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经济环境,《会计法》于1993年作了第一次修改,并于1999年进行第二次修改。在第二次修改过程中,父亲已卧病在床,但他始终关注着《会计法》的修改问题。每当有关同志去请教他时,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病痛,撑着虚弱的病体耐心解答问题,陈述自己的见解,对《会计法》的修改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宝贵的意见。他这种对工作、对事业的忘我境界,使在场的同志感动不已。

1980年,在对文革时期会计制度进行全面修订的基础上,出台了文革后第一部全国统一的会计制度——《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并以此带动了企业会计制度的全面修订。随后,会计司相继制定发布了国营供销、施工、基建单位等行业会计制度及一系列相关财务会计核算办法,为拨乱反正、建立新时期会计核算体系奠定了基础。

为适应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父亲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第一部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的会计制度——《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为我国扩大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其后为适应市场经济而进行的全国范围的会计核算制度改革奠定了基础。

自1993年始,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我国开始着手制定具体会计准则,父亲担任了会计准则中方专家组组长。我国过去没有会计准则,对制定准则没有经验,在准则制定过程中常常遇到困难。为破解难题,他殚精竭虑,对每一份征求意见稿,他都要亲自审阅并提意见。他以渊博的知识、深厚的会计专业功底和对中国社会经济环境的深刻认识,积极推动我国会计准则的诞生。

前财政部部长王丙乾称他为“中国社会主义会计制度的奠基人”。

他果断提出重建注册会计师制度 80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大量“三资”企业开始设立,客观条件要求实行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时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的父亲,上书财政部领导,果断提出恢复重建新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并得到了批准。为此他多次往返北京与上海之间,发动一大批三四十年来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老专家重操旧业,并支持上海会计师事务所率先成立,开启了新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之先河。早在起草《会计法》时,父亲就力主在《会计法》中应写进注册会计师的相关条款,为会计师事务所成为法定中介机构,为《注册会计师条例》的制定和实施确立了法律基础。

1988年,已经从行政领导岗位退下来的父亲接受财政部的重托,负责筹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并担任首任会长至1992年。在此期间,他坚持提倡要尽快恢复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制度,使那些具有真才实学,并且年富力强的中青年进入注册会计师行业,迅速改变注册会计师队伍的年龄结构。1991年举办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注册会计师统一考试时,他担任全国考试委员会副主任,并亲自主持命题工作。现在有关考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都浸透着父亲的心血。父亲时常关心着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发展。1994年开始研究制定中国的独立审计准则时,父亲尽管年近80高龄,还亲自担任财政部中方专家咨询组组长。

注册会计师事业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迄今全国已有十几万注册会计师大军。想来父亲在天之灵得以慰藉。

他非常重视会计理论的研究和发展 父亲在主持会计司工作期间,一方面切实抓好会计核算制度改革,一方面努力推动会计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促进会计事业蓬勃发展。

1979年3月,中国会计学会筹备组成立,父亲任组长。1979年底,中国会计学会成立大会在广东佛山召开,中国会计学会正式成立,父亲任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这次大会是我国建国以来会计学术理论界的第一次盛会,标志着我国会计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会计学会成立的头几年,每年召开一次年会,要求会员及其他会计界人士就当前的会计问题提交论文并进行大会研讨,以此推动我国会计理论研究方面的交流与发展。为此,学会还于1980年3月创建了《会计研究》杂志,父亲亲任主编。

父亲特别关注会计理论研究,以求实创新的精神和勇气向传统理论、西方理论提出挑战,并多有建树。于80年代,他与闫达五教授共同提出的著名的“会计管理论”,是我国会计基本理论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是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发



1988年在非洲会计教育国际会议期间会见非洲开发银行行长N'DIAYE先生。

展会计理论的一项重要成果。这一理论观点,对近20年来我国会计理论和实务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和推动作用。

他身体力行推进会计界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会计界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主要是以会计学会作为窗口的。作为中国会计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父亲深知对外交流和自身作用的重要。为使国际会计界认识和了解中国,父亲曾率团或单独到境外讲授中国会计,还应国外同行之邀,写出了“中国会计”等著作,在境外以中、英两种文字出版。

1985至1991年,父亲担任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间专家工作组中国代表,每年前往联合国参加工作组年会。这个工作组当时是我国所加入的唯一一个国际会计组织,是我们能够就国际会计问题发表意见、参加讨论的唯一国际会计论坛。他总是不失时机地抓住机会,介绍我国的会计发展情况,宣传我们的会计思想,积极参加会计专业技术问题的讨论,阐述我们的观点和立场。作为中国会计界的杰出代表,父亲在国际会计界享有很高的威望。每有国外同仁与中国会计人士相遇,“Professor Yang”总被常常提起。

父亲在日常工作中关心和培养干部 他对身边干部的培养倾注了极大的爱心,对他们既压重担,严格要求,一丝不苟,又放手让他们去干,并不忘随时指导点拨,耐心解说。为培养干部他从不吝惜时间、精力和心血。他以他的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批对工作兢兢业业、认真严谨、能够独立担当重任的业务骨干。

为了尽快改变我国会计队伍学历结构低、专业素质弱,难以适应工作要求的状况,他与财政部原副部长谢明同志一道,亲赴山西等地考察总结开展会计函授教育的经验,创办了我国会计教育战线办学规模最大、布点最多且适合在职会计人员要求的中华会计函授学校。

1989年4月至1990年4月,父亲组织领导了中国会计学会与华人世界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首届全国会计知识大赛。此次大赛共有260万人参加,其规模之大、热情之高、时间之长、影响之广、效果之好,都是空前的。李先念、薄一波等国家领导人分别为大赛题词,当时的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王丙乾同志在大赛期间作了三次重要讲话,对大赛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此次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全国广大会计人员学习钻研业务的热情,为培养和选拔会计人才、提高会计人员的思想和业务素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六、分秒必争的勤奋学习和工作精神

父亲一生信奉并身体力行的箴言是:“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业精于勤,行成于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父亲知识的渊博,与其勤奋和刻苦分不开。

熟悉父亲的人都知道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脑子不能停顿。按他自己的话说是除了吃饭、睡觉,脑子始终处于思考状态,从来没有空白。大家在一起聊天,间或有停顿,他会马上拿起报纸或书籍阅读,谈话继续时,他马上放下报纸书籍加入交谈。

父亲对时间抓得十分紧,永远是分秒必争。他一边走路一边看书的故事曾被人传为美谈。对此他风趣地说,我一心几用,走路看书不会撞到树上。

父亲有剪报的习惯,看到有用的资料马上剪下,形成自己的资料库。

父亲的许多文章是在夜里写就的。常常是睡到半夜,脑子里突然涌现对某问题的想法,马上起床,提笔写下。

父亲学识渊博,不仅仅体现在对会计研究的精深,也不

仅仅体现在对财税、金融、证券等相关经济领域的谙熟。他的知识领域十分广泛,对历史、人文、社会等学科均有研究。他对中国历史的熟悉程度令人惊叹,对古典文学也颇有造诣,特别对古诗词情有独钟,往往兴之所至,吟诵抑扬,兴起吟诵,陶醉在古诗词优美的意境中。

七、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

以父亲60余年从事会计数学的生涯,虽然多数时间是兼职或业余教学,但仍是桃李满天下。令他老人家十分欣慰的是他带的一批批硕士生、博士生都学有所长,在祖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传播着父亲一生积累的理论、方法和学识。

兴办会计研究生教育,培养会计高级人才。粉碎“四人帮”之后,父亲凭着职业的敏感性,预感到经济建设高潮即将到来,会计也将有一个大的发展。为此,必须在理论和人才上预先作好准备。基于这种认识,他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着手筹备成立中国会计学会和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在财政部领导的支持下,1978年他和许毅教授一道在财政科学研究所组建了研究生部,1979年开始招收会计专业的研究生。就当时的物质条件而言,不要说培养研究生,就是办一所小学也不具备起码的条件。没有教室和宿舍,就用地震棚代替;没有课桌椅就到附近的中学去租……好在这些研究生长期以来接受艰苦朴素的教育,在物质方面并没有提出过多的要求。同时他们也清楚地知道,能师从杨纪琬先生是多么机会难得。

1979年,他招收了一批英语专业的会计研究生,对他们进行了一段时期的会计教育后,将他们送到海外实习培训,开创了会计人才国外培养之先河。当时曾有人对此举不理解,后来回过头来看,不得不赞叹此举的远见与高明。

80年代中期,信息技术发展迅速,父亲敏锐地预见到它将给古老的会计带来变革和生机。在父亲的主持下,于1985年财政科研所研究生部创建了会计电算化专业,培养出一批批会计电算化领域的复合型人才。我也始与父亲合作,成为了该所会计电算化专业的导师。

严谨的治学和工作精神 父亲治学的严谨有口皆碑。他从不人云亦云,每有文章面世,必有创新的观点。正如他自己在所著《社会主义会计理论建设》一书的自序中所言,“惟自审每有写作,大都是经过长时期的深思默索而形成的自己的观点,往往为求此一得之见,历经数月的踟蹰,力求不宥于成见而有所创新,以期无愧于读者”。

工作中,他常对周围同志说的一句话是:“外国这样规定不一定就对,在那里合理在我们这里不一定合理。我们的规定要有我们自己的道理,要能够自圆其说”。

在与国外同行的交流、讨论中,他因对问题研究的精深

和见解的独到,常赢来钦佩和折服。对此,他曾不无得意地说:“这是因为我是知己知彼,既研究了外国,又了解中国;而对方则是只知己,不知彼”。

作为会计大家,在学术问题上父亲从不以势压人,不论是对自己的学生还是对持不同学术观点的朋友,从来都是把对方和自己放在平等的地位,先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再阐明自己的观点,以理服人。

“只有99分的学生,没有99分的会计” 这是父亲的一句口头禅。他老人家解释说:当学生时,考100道题答对99道是好学生;当会计时,记100笔账错一笔就是不合格的会计。父亲常用这句话告诫学生,做会计工作首先要有敬业精神,必须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来不得半点马虎,否则就无法胜任会计工作。父亲对会计工作严谨性的分析可谓入木三分。他的学生有不少已为人师,但一直牢记父亲的这一教诲,并在教学中向自己的学生反复宣传父亲的这一精辟论述。他们中的有些人可能早已忘记了父亲讲课的内容,但永远不会忘记父亲的这句名言,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为学生改错别字和标点符号 在财科所第一届会计学硕士生毕业时,父亲共指导了13篇硕士论文。每一篇论文,从选题、收集材料、拟定大纲到确定文章结构,父亲事必躬亲。尽管他当时身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忙于行政事务和会计改革的方针大计,又兼全国政协常委和民革中央常委等职务,可谓百事缠身,但对学生的毕业论文却是抽百忙之暇,甚至牺牲休息时间,反复审阅,仔细推敲。不要说是一个站不住脚的论点,或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引证,就是一个错字、别字,甚至一个错误的标点,也难逃过他老人家的眼睛。他特别强调不要小看了这些标点符号错误,并且深情地回忆起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告诉学生五六十年代周总理批阅财政部文件时就是连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也要改正过来,希望学生们学习周恩来总理认真的工作作风。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父亲经常讲,光会读书,充其量是个书生,会计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践问题。所以,除了向书本请教外,还必须向实践学习。他言传身教,使学生们在毕业前掌握了调研的基本技能,能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学生们走上工作岗位后,大都能作到理论联系实际,很快适应工作。国家教委的同志曾评价道,财科所的研究生,不仅基础理论扎实,还有很强的动手能力。目前,他的学生无论是在实际部门还是在教学、科研部门,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中有不少学生已走上了领导岗位。学生们在回忆父亲时,都会发自内心地说,杨老的教学,不仅给了他们“黄金”,还教会了他们“点金术”,使他们受益一辈子。

凡有幸受教于父亲的学生,都无不为他老人家的点点滴滴所折服。作为他的长女,我和父亲共同生活了将近61年,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慈父也是良师益友,更是一位善良、对弱者充满同情心的血肉之躯。

时光匆匆,当时钟敲响了共和国50周年诞辰的时候,父亲却溘然长逝已近8个月。我常在梦中见到父亲久居的老屋和那熟悉的身影。在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是那样慈祥和蔼,总是有讲不完的知识,说不尽的故事。言谈举止中,启发了我学会做人的道理,学会了对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父亲不断地督促,勉励我上进求学,刚正做人。在父亲敬业精神的影响下,儿孙中有不少人先后继承了他的事业,努力地从事并深深地热爱会计工作。此时,这一幕幕往日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恍惚如昨。我想念父亲,多么希望他能够慢些走,看到祖国会计事业蓬勃发展,后继有人。

11月10日父亲82岁诞辰和从事会计工作62周年纪念日。献上本文以寄托我的哀思。泪水伴着绵绵的思念,父亲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责任编辑 秦中良



杨纪琬教授最后一次和学生一起过生日。